

经济发展视角下的

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
问题研究

王 辉 ◎著



科学出版社

经济发展视角下的中国农村 收入不平等问题研究

王辉 著

德州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快速增长，由于政府在法律、税收、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度改革的滞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没有延续“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农村收入不平等的现象逐渐凸显，这种不平等不仅仅表现为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还表现为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上升，而收入不平等的上升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本书从增长、消费、预防性储蓄、贫困减少以及技术进步的角度研究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通过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分析，探索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消费结构变迁、预防性储蓄、农村贫困以及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书的读者对象为从事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问题研究的学者、高等院校教师以及需要了解中国农村收入分配问题的读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发展视角下的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问题研究/王辉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3-034589-9

I. ①经… II. ①王… III. ①农民收入—收入差距—研究—中国 IV. ①F3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5544 号

责任编辑：唐薇 赵静荣 / 责任校对：李莉

责任印制：阎磊 / 封面设计：迷底书装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科印技术咨询服务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0

字数：230 000

定价：5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阿特金森（Atkinson）曾指出，“没有任何一个问题比收入分配更令人感兴趣，但也没有任何一个经济问题像收入分配一样缺少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公平和效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追求公平的分配方式必然以效率的损失为代价，库兹涅茨（Kuznets）的倒“U”型理论似乎支持了这种取舍关系，即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呈现出扩大的倾向，而在随后的时期，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收入分配状况将得以改善。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量经验性研究表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的相关性，收入的不平等提高了机会的不平等，遏制了人力资本的形成，并削弱了制度的发展。因此，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相关性。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2009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9%以上，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和严重，收入分配不平等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和政治稳定的重要问题。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初期，中国农村经济不但增长迅速，而且农村内部收入分配的差距也不断下降，改革遵循了“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双赢局面。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快速增长，由于政府在法律、税收、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度改革的滞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没有延续“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农村收入不平等的现象逐渐凸显，这种不平等不仅仅表现为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还表现为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上升，而收入不平等的上升严重

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主要是针对增长的源泉和增长核算的研究，因此并没有区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概念。刘易斯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指出，经济增长就是“一国人均产出的增长”，增长理论更注重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而并没有涉及一些规范的价值研究，如社会公平、收入分配、消除贫困等。但是，经济增长的实践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存在许多结构性矛盾和制度上的缺陷，如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市场机制不完善、金融发展对经济的抑制以及政治体制缺陷等问题，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单纯地依靠经济增长就能解决的。鉴于此，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不仅仅是产出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社会质量的提高，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指出：“发展必须被视为是一个既包括经济增长、缩小不平等和根除贫困，又包括社会结构、国民观念和国家制度等这些主要变化的多元过程。”因此，经济发展应该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不仅包括经济总量的变化，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等）和经济质量的提高（技术效率提高、增长方式的转变等）。托达罗在《发展的含义》一文中指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即生存（sustenance）、自尊（self-esteem）和自由（freedom），认为发展既是一种物质现实，也是一种精神状态，因此，人均GDP不能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单一指标。

本书从增长、消费、预防性储蓄、贫困减少以及技术进步的角度研究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通过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分析，探索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消费结构变迁、预防性储蓄、农村贫困以及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一，从收入构成的角度对导致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对农村居民收入构成的分析发现，当前阶段造成农村总体收入不平等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差距，研究期内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拟基尼系数始终大于总收入的基尼系数；而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拟基尼系数小于总收入的基尼系数，这两种收入构成对总收入不平等具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从各个收入构成的拟基尼系数弹性分析上看，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对收入差距扩大和缩小的作用逐渐减弱；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在样本期内整体上有所提高，尽管当前其对收入差距的贡献较小，但是，提高转移性收入、加大转移性支付的力度应是降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

第二，对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相互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有利于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而农村地区经济的

增长却具有降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这两种相反的力量缓解了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但是，在农村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平等本身会引起更大的不平等。虽然，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对不平等的缓解作用逐渐增强并超过不平等自身的惯性作用，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作用过程，并且从累加效应上看，这种作用不足以导致收入不平等的下降，因此，农村经济自身并不能产生涓滴效应。另外，富裕的阶层存在将资产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倾向，不利于农村地区投资的增长，对于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而言，提高农村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改变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的流出效应，是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三，验证了农村收入不平等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传统的凯恩斯消费理论认为，收入的不平等导致居民消费水平的下降。本书采用持久收入模型分析发现，随着我国农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不平等对农村消费水平具有促进作用。农村居民的基本需求占纯收入的比重呈现倒“U”型形态，说明我国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已经得到满足；高收入阶层相对于低收入阶层而言具有较高的收入弹性，说明当今农村居民正处于消费结构升级的转型时期，如何转变消费观念，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是推动农村地区消费增长的主要思路。另外，从区域间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分析来看，消费的基尼系数呈现倒“U”型，本书认为，这反映了我国农村居民对于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以外的消费十分谨慎，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产生的收入和消费的不确定性使得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水平不断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

第四，利用农村居民家庭收支的分组数据研究预防性储蓄行为对我国农村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尽管收入分配对降低预防性储蓄的作用相对有限，但是收入分配、以至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仍是制约消费的增长、导致我国农村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因素。

第五，分析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我国农村贫困的影响，由于收入分配状况的不断恶化，收入分配吞噬了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贡献，拖累了贫困减缓的步伐，反而导致了贫困问题的日益严重。因此，对于我国农村减贫问题而言，降低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建立和完善惠及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分配政策，使得低收入阶层也能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水平的提高，是解决问题的重中之重。

第六，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分析。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中国区域农村经济的技术效率进行分析得知，劳均物质资本和劳均人力资本差异是造成全国范围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提高固

定资产投资、加大教育投入改善教育环境是落后地区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的主要手段；从东、中、西部各自的发展情况看，劳均物质资本是影响东部地区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劳均人力资本是影响中部地区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而二者均对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产生重要的影响。另外，本书还以乡镇企业要素分配的数据验证了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不平等恶化的促进作用。

本书共分为七部分，具体的结构安排为：

第一部分对经济发展理论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与描述。

第二部分对中国农村居民内部收入不平等和区域间不平等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探究造成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具体原因。其主要内容包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总体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变迁的轨迹；通过对收入构成的分析研究造成中国农村居民总体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等。

第三部分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包括利用SVAR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内部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以及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区域间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

第四部分是关于收入不平等与消费不平等关系的研究。首先利用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数据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对消费增长的影响，并采用ELES模型对这种影响加以解释；其次，讨论了区域间不同收入水平下的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变动趋势及消费结构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并利用“心理账户”理论分析收入结构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第五部分从预防性储蓄的角度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农村消费疲软、储蓄率居高不下的影响。该部分主要利用农村居民收入分组数据，对不同收入分组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及预防性储蓄的比例进行测算，通过对不同收入分组的比较，分析收入不平等对预防性储蓄和储蓄率的影响。

第六部分研究了中国农村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与贫困减少之间的关系。该章以洛伦茨（Lorenz）曲线为基础，通过建立贫困指数衡量中国农村贫困率的变化，并将贫困弹性分解为收入偏弹性和分配偏弹性，结合贫困减少指数，来说明中国农村贫困变动的趋势及影响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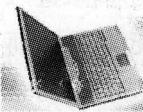
第七部分分析了技术进步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其主要内容包括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省际间农村技术进步对收入增长的影响，考察了农村不同地区各投入要素对居民收入的贡献；并通过采用乡镇企业收入分配数据论证了技术进步过程中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程度恶化的趋势。

目 录

前言

第 1 章 经济发展理论概述	1
1.1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1
1.2 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	7
1.3 新制度主义经济发展理论	9
第 2 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概述	11
2.1 不平等的概念及度量	12
2.2 中国农村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变迁	14
2.3 中国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变迁	24
2.4 本章小结	35
第 3 章 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分析	38
3.1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经验事实	38
3.2 关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41
3.3 中国农村总体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	48
3.4 中国区域农村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	57
3.5 本章小结	66
第 4 章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与消费	68
4.1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与消费变动	70
4.2 中国区域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差异分析	84
4.3 本章小结	91
第 5 章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与预防性储蓄	92
5.1 中国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分组描述	95
5.2 不同分组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分析	96

5.3 农村居民预防性储蓄比例的测算	98
5.4 本章小结	100
第6章 中国农村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与贫困减少	101
6.1 分析框架和模型	102
6.2 实证分析	106
6.3 本章小结	111
第7章 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与技术进步	112
7.1 技术进步的含义	114
7.2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及其分解框架	116
7.3 中国农村区域技术效率差异分析	119
7.4 技术进步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以省际乡镇企业数据为例	128
7.5 本章小结	134
参考文献	136
附表	146



第1章

经济发展理论概述

■ 1.1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结构主义的非均衡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研究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经济学家号称“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他们是西方最早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学者，包括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刘易斯、缪尔达尔、辛格、普雷维什、赫希曼和钱纳里等，他们深受凯恩斯资本主义经济非均衡分析和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主张的影响，深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结构中长期积累的弊端是其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主张发挥政府干预、进行结构改革、推进资本积累，以实现工业化来促进经济增长。

1.1.1 罗森斯坦·罗丹：“大推进”理论

1943 年，罗森斯坦·罗丹在《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的名为“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的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大推进”(the Big Push)理论，他认为只有各类工业并举，才能冲破市场容量狭小的限制；主张通过大量投资扩大资本规

模，以适应投入与产出的不可分性。罗森斯坦·罗丹认为：“‘要想有任何成功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升空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在功效上并不能与各个部门相加的总和相等。一笔投资的最低限度数量是成功的一个必要的——尽管不是充分的——条件。概言之，这就是‘大推进’理论的论点。”“大推进”理论基于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特别是社会基础资本供给(即资本的集聚性，lumpiness of capital)中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以及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三个假设基础之上。罗森斯坦·罗丹认为，投入、生产过程或产出的不可分性会产生递增收益。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表现为资本的集聚性上，即诸如电力、运输或通信在内的社会基础资本是不可分的。这些产业具有一次性投资量大和可变成本低的特征，它们构成了整个经济的基础结构，并且，不可分性的存在使得这些社会基础资本所提供的服务不能依赖进口，因此，这些产业必须先于那些能更快地产生收益的、具有直接生产性的投资。以19世纪中叶兰开夏的纺织业为例，当时，印度被牢牢地控制在英国的统治之下，由于印度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资本，尽管印度的工资比兰开夏低得多，兰开夏的纺织业企业家也无法利用这种优势。需求的不可分性表现在需求的互补性上，与产出的增加相对应的是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收入不会全部用于作为其来源的一一对应的增加的产出的消费，即一家制鞋厂的工人增加的收入不会全部花在鞋子上，这样，找不到市场的风险就会降低投资的刺激，而需求互补性能降低这种风险。

但是，在欠发达国家，大多数产品的需求是高度无弹性的，低需求弹性使供给适应需求变得更加困难，这加大了任何一个单独产业进行单独投资的风险，必须利用需求的互补性来降低这种投资风险，这就“要求有一个最低的投资量，以便生产出大量额外的‘工资品’，使额外的雇佣工人把他们的额外收入用在这些工资品上”。储蓄供给的零(或非常低的)价格弹性以及储蓄的高收入弹性构成了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对于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罗森斯坦·罗丹认为，社会基础资本的形成需要高水平的投资，而高水平的投资要求高水平的储蓄量，这样的储蓄水平在欠发达国家是难以达到的。这就要求欠发达国家采用某种机制，当收入增加时，使得边际储蓄率高于平均储蓄率。罗森斯坦·罗丹基于上述假说论述增长问题时指出，由于欠发达国家市场的不完全性，货币的外部经济导致的价格机制无法提供指导经济趋向最优路径的信号，除了市场价格之外还需要有额外的信号装置——计划。

1.1.2 纳克斯：不发达国家资本形成

1953年，纳克斯在其《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了“贫穷的恶性循环”理论，也认为单靠个人数量有限的投资是不可能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只有把数量上足够打破这种循环的资本同时投入到各种行业中去，才能打破资本形成不足导致生产率难以提高、而低生产率又造成低收入的不良循环。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它穷”，这种循环关系导致穷国维持其贫困状态，在这种循环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阻碍资本积累的关系。贫困导致储蓄低下、资本匮乏，而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低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匮乏所致，低生产率又导致低实际收入；并且，由于人们的购买力很低、投资引诱水平较低，较少的资本数量使得低下的生产率水平继续得以维持，实际收入难以提高。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应该或多或少将资本同时广泛地用于不同的行业，因为单个企业在一个特定行业的投资引诱可能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而对不同行业领域的广泛投资会促使行业之间相互支持，这种支持为单个企业的投资开辟了道路。即同时扩张的工厂之间在生产上可以互相协作，形成生产、运输、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便利，获得外部经济效益，产生递增的收益；同时，在需求方面能得到产品销售市场的相互补充；大规模同时对各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加强各类产业之间的横向和纵向联系，进一步推动分工协作，提高社会固定资本的利用效率。所以，摆脱“贫穷的恶性循环”的途径就是在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全面大规模的投资，实行平衡增长战略。

1.1.3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

刘易斯(Lewis, 1954)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他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划分为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和传统农村农业部门，这种现代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并存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该模型研究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现代工业部门的就业和产出增长问题。刘易斯认为，现代产业的发展需要资本和劳动力两大生产要素，而劳动力是由传统农业部门提供的，因此，在刘易斯的模型中，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即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其特征是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因此，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减少并不会影响农业部

门的产出；而城市工业部门由于具有远高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加上工会的作用，其工资水平远高于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刘易斯认为其数量为农村部门仅能维持生存的平均固定工资加上一个增加值，这个增加值是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吸引出来所必需的搬迁补偿等费用，刘易斯估计工业部门工资水平比农业平均收入高30%左右，就可以吸引农业劳动力流入城市，满足工业部门扩张的需求。当工业部门扩张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相对无限供给使得工业部门可以按照既定的工资水平获得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力。

由于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资本积累，“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占国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这之所以是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刘易斯假定现代工业部门的投资来自资本家的利润，利润越大，资本积累的速度越快，在现代城市工业部门工人工资不变、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具有无限弹性的条件下，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按照要素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确定劳动力的需求曲线，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就业人数不断增加，直到所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完全吸收。因此，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中，现代城市工业部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经济发展就是现代部门相对于传统部门不断扩张的过程，但是如果资本积累赶上人口增长，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后，劳动力成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工资就会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这个时候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停止。

1.1.4 缪尔达尔：“回波效应”与“扩散效应”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于1955年提出了“发展极”(development poles)概念，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通过某些地区的优先增长来带动它们周边更多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实际情况是，在“发展极”尚未达到较大规模之前，它主要是吸引其他地方的资本、人才和技术，这就削弱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实力，加大了区域间的差距，即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的条件下，市场力量的作用一般倾向于扩大而非减少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用“回波效应”(backwash effect)说明“发展极”对其他周边地区的负面影响。缪尔达尔认为，劳动力、资本、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并不能抵消地区发展不平等的趋势，

经济活动的扩张会使得发达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而资本流动和贸易活动也基本上倾向于发达地区。所谓“回波效应”，是指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收益差异的吸引下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回波效应”使落后地区失去人才而进一步放慢发展的步伐。经济迅速增长地区，需求扩张较快不断拉动投资增长，投资扩大又反过来增加收入和需求，导致另一轮投资扩张，如此循环积累将使贸易也成为把落后地区的储蓄转移到经济快速增长地区的工具。区域贸易的发展有利于经济迅速扩张地区而不利于落后地区，竞争的结果会严重影响落后地区的企业经营，甚至引起企业倒闭。

当然，“回波效应”也是有限度的，当“发展极”达到一定程度后，它还会产生“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即经济中心的扩张使得位于扩张中心周围的地区受益。缪尔达尔认为，发达地区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引起生产要素供应紧张，使为该地区不断增长的工业提供原材料的条件逐渐有利于落后地区，贸易条件的改善导致投资、就业以及消费的增加，如果这种新的扩张力量强大到能够克服老经济中心的“回波效应”的话，那么落后地区就会摆脱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形成一个新的自我维持的经济扩张中心。另外，从发达地区自身来看，扩张导致生产成本上升，有利的投资机会减少，发达地区的资本必然向其他地区寻找出路，这时，会出现资本技术向落后地区扩散的现象。同时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减缓也有利于价格的回落，刺激落后地区需求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

1.1.5 赫希曼：不平衡增长战略

赫希曼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对平衡增长战略进行了批评，提出了不平衡增长(unbalanced growth)战略。他对平衡增长战略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赫希曼认为平衡增长的思想来自于凯恩斯的低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理论。在低于充分就业均衡时，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拉动厂商增加生产，达到经济复苏的目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不是资源闲置而是资源短缺，尤其是资本大量短缺，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条件完全不一样，不管政府怎样进行干预，要想实现产业的平衡增长都是不可能的。赫希曼认为，“大推进”理论所主张的，通过大规模投资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增长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因为发展中国家缺少的正是经济发展中的资本要素。平衡增长理论试图用发达国家的情况来说

明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忽视了二者在基本经济条件上的差异，因此其理论是“早熟的”。

因此，赫希曼主张当一个国家的投资需求超过既有的资源量时，就应当按照产业贡献对投资项目进行排序，优先发展效率最高、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项目，以实现关键产业的突破性发展，通过引致出新的投资来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这个选择标准就是“引致投资最大化”，即投资于该项目能通过自身发展引致其他项目发展最快。

其次，发展是经济从一种类型向其他更先进的类型转变的渐进过程，各国的增长过程都是不平衡的。赫希曼用关联效应说明不平衡增长过程。所谓关联，是指经济运行中一个部门在投入和产出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联可区分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前者是指一个部门和吸收它的产出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后者是指一个部门和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联系。由于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存在，投资过程就仿佛是一种钳形运动，行业 A 的建立导致了行业 B 的建立，如水泥厂的建立导致了生产水泥预制板的企业的建立，尽管 A 在建立之初是对当时最终需求的反应，但其现在也要满足新行业 B 的需要，即 A 的存在诱导了 B 的建立，而 B 的建立反过来又诱导 A 的发展，产生新的生产能力。即具有关联效应的产业都能通过产业扩张引致投资增加，而引致投资又通过关联效应反过来推动该产业进一步扩张，从而使得整个产业部门都获得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赫希曼认为，一个产业的关联效应该用该产业产品的需求弹性和收入弹性来衡量，一个产业的产品的需求弹性和收入弹性大，则表明该产业的关联效应大，不论这种关联效应是前向关联还是后向关联，都能通过产业扩张引致大量投资。如果一个产业与其他产业有较强的前向和后向关联关系，那么，该产业率先发展将有利于带动其他产业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类产业即罗斯托所说的“主导部门”。赫希曼认为，发展就是通过经济中的主导部门的成长带动其他部门的成长，由一个行业或一个厂商的成长引起另一个行业或厂商的成长来实现的。在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各行业都受益于前一阶段增长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效益，同时又通过新的扩展再产生外部经济效益，为其他行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应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确定主导产业群，并通过对主导产业部门的重点投资促进它们的发展，再利用其关联作用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实行不平衡增长战略可以使发展中国家有效地利用其有限的经济资源加速经济增长。

■ 1.2 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

1.2.1 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

舒尔茨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的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引起了经济学界的轰动，他提出和阐述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以及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舒尔茨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剩余之谜”的解释忽略了“报酬递增”现象，舒尔茨从农业发展的角度研究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技术进步论仍然强调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而忽略了“人”的因素，经济学家在研究农业问题时高估了土地的作用而低估了人的作用，“土地本身不是成为贫困的一个关键因素，而人是一个关键因素：提高人口质量的投资能显著改善穷人的经济前景和福利回报。儿童保育、工作经验、通过上学得到的信息和技能，以及投资于健康和教育的其他方式都能够有效改善人口质量。我将说明，低收入各国的这类投资，只要在它们未被政治不稳定破坏的任何地方，对改善经济前途一直是成功的”。即古典的劳动概念没有考虑人力资本因素，仅仅将劳动看做从事体力劳动的能力，劳动者所具有的生产能力被假定为同质的、大致相等的，增长的核算把资源的质量排斥在外，这种狭隘的资本与劳动力计算方法导致了“增长余值的困惑”，研究现代经济增长必须考虑现代劳动的概念，即使用现代人力资本概念，缺乏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率是十分有限的，“没有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要取得现代农业的成果和达到现代工业的富足程度是完全不可能的”。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的范围和内容包括五个方面：①医疗和保健，从广义上讲，包括影响一个人的寿命、力量和耐久力、精力和活力的所有费用；②在职人员培训；③正式建立起来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④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⑤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舒尔茨还提出了提高人力资本的九项建议：①赋税法要改变歧视人力资本的现象；②适当的支付以减少人力资本闲置时的损失；③消除职业自由选择上的各种障碍；④要在资本市场上完善人力资本投资；⑤对人口流动进行投资；⑥重视低收入群体，要对低收入群体的下一

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⑦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改变某些方面严重不足的状况；⑧要研究那些接受了公共人力资本投资的人是不是应该得到这类投资所产生的收入；⑨要重新估计不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要重视人力资本投资。

1.2.2 明特：温和的新古典主义

明特接受新古典主义，肯定了市场机制作用。明特认为，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力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力量是初级产品输出和货币经济的发展；第二种力量是人口的增长。为此，明特将不发达国家分为没有显著人口压力的国家和有显著人口压力的国家两大类。明特认为，外国经济的冲击瓦解了不发达国家的自然经济，与国外产品的交换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从而有助于不发达国家形成现代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另外，由于存在廉价的劳动力，不发达国家的企业（主要是一些种植园和矿山）就会选择低工资政策，低工资政策导致低生产率，如此产生低工资和低生产率的恶性循环，外国经济的冲击不仅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本和外汇，还为其提供各种新思想和专门的技术知识。明特还认为，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应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当然，在不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也不同。如果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较大部分是自给性经济，那么政府的责任就是把自给性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如果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较大部分是商品经济，那么政府的责任就是通过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推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

1.2.3 瓦伊纳：自由贸易论

瓦伊纳 1952 年发表了“来自对外贸易的利益”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古典贸易理论，批判了辛格—普雷维什的贸易条件恶化论。瓦伊纳认为古典自由贸易理论中的商品贸易条件恶化时有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即假设由于报酬递减规律和效用递减规律共同作用，生产通常是在边际生产率递减的条件下进行。瓦伊纳批评幼稚产业保护论，他认为：“(1)对保护产业的选择常常是武断的和非理性的；(2)一旦以任意理由同意保护，就会打开胡乱保护的大门；(3)对特定工业的保护可能刺激它开展，但同时也可能抑制或延迟它真正走向经济独立性，因为它为那些在该工业工作的人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使他们免遭惰性、无效率或限制性垄断